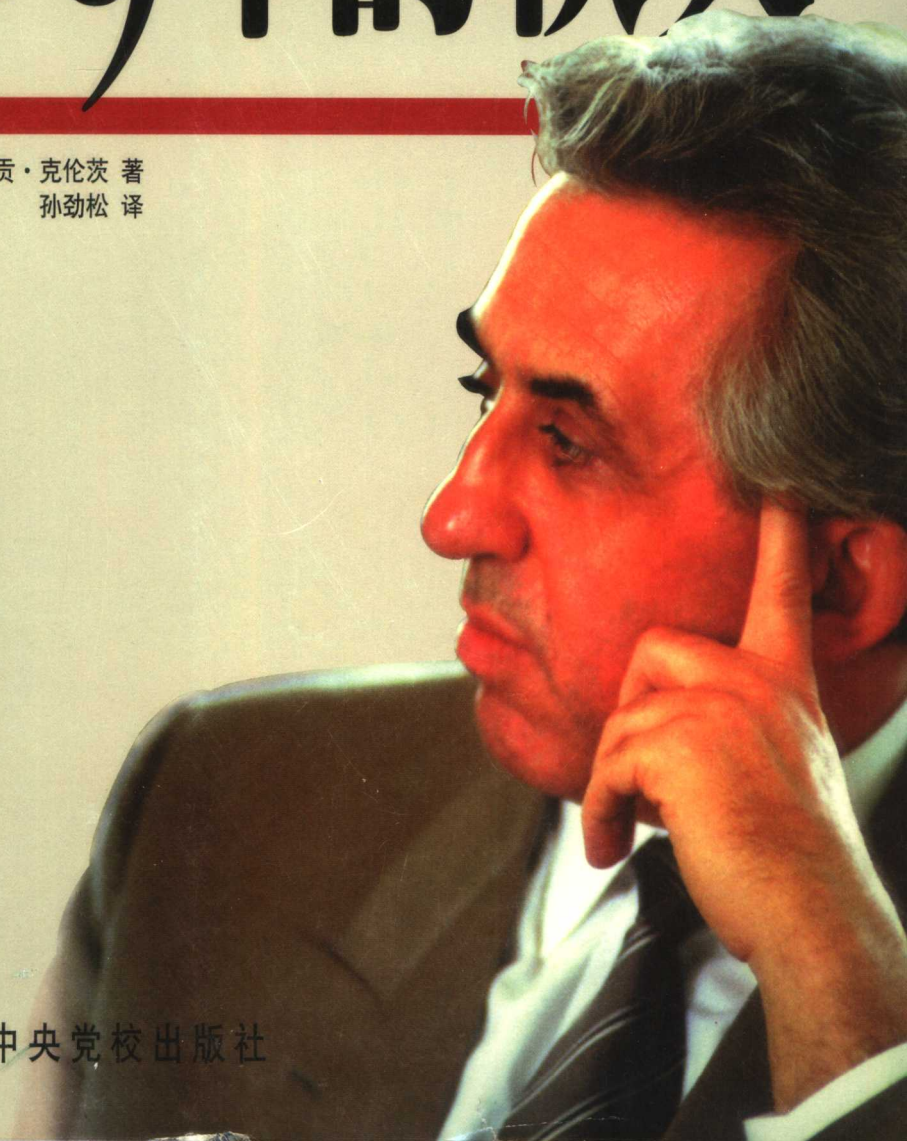


EGON KRENZ

Herbst'89

89年的秋天

[德] 埃贡·克伦茨 著
孙劲松 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KRENZ

89年的秋天



本书译者(右)与克伦茨在他柏林的家中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龙炜君
封面设计 李法明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王洪霞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036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89年的秋天/(德)克伦茨著;孙劲松译. —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5. 1
ISBN 7-5035-3117-7

I. 89… II. ①克…②孙… III. 政治事件-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1945~1990)-1989 IV. D7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9343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装订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5

字数:32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35.00 元

EGON Herbst'89

[德] 埃贡·克伦茨 著
孙劲松 译



前 言

这本书是我对 1989 年秋天的叙述。我写的事件，都是我所经历过的，也是我同许多原民主德国和外国政治家谈过、与不同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以及他们的顾问和他们的反对者交谈过的事情。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去世，而那些还活着的人，他们的看法和行为已经与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对过去事情和个人作用的描述总是或者加以修改、润色，或者根据他们的利益、生活状况和性格做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

以前，我有责任对国家机密文件保守秘密。今天，我还能读到这些国家机密文件，因为自从民主德国不复存在以来，这些文件已经不是国家机密了。它们静静地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档案馆里。在这个档案馆里，我把我个人的笔记、日程表、记录本和信件与档案馆里的材料做了比较。还有一些材料在这个联邦档案馆里已经不见了，它们是我在 1989 年的时候放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我的保险柜里的。在某些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当历史上出现了今天这种情况，像如何对待艾里希·昂纳克，或者我与联邦德国政治家们私下谈话的笔记，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国家档案馆里的材料在保密 30 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以后，即可对外公开，也有的是永远不会对外公布。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机密文件的处理办法却不是这样。民主德国的文件从 1990 年起就被公开了，而且也没有人对此提出反对。但是，联邦德

国、美国还有苏联并没有公布与之相关的国家机密文件。我认为，当我们读到两个德国的文件、联邦德国的新闻机构和法律文件的时候，如果有一天这些文件能够被公布的话，将对我们了解波恩政府，它对德国分裂负有的责任，它在冷战中反对民主德国的各种手段，西德公民以及它的秘密警察机构对民主德国内外的所作所为等，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今天人们不可能得到它们。如果有一天在东西方之间能有一种对待国家文件的平等条件的话，那么，我们的后代也许可以毫无偏见地谈论德国的战后历史。这里所涉及的不只是民主德国，而是两个德国。现在，一段客观的历史存在不得不让位给黑白两色的主流图画：即左派是地狱，右派是伊甸园。虽然，这并不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真实写照。

其实，我的叙述是从秋天之前开始的，即1989年7月7日开始。此时，华沙条约国正在布加勒斯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那时有些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的事情，成为后来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的先兆。

从1989年10月8日到12月6日的这段时间里，日记已经不仅仅是一本日记了。对我来讲，1989年是一段让人很难过的日子。尽管如此，我每天还是把重要的事情和会见记录下来。这个做法使我在今天还能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再现出来。我还努力使这些事件的再现不带有今天的观点。我叙述的是1989年时我的想法。我不愿意把后来的更清晰一些的认识当作当时的想法。我叙述的是1989年在我工作中的想法、做法和感觉，以及形势对我的影响和我怎样试图去影响形势。

本书所涉及的人，都是我在1989年秋天打过交道的人。尽管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事后的表现既没有政治道德，也没有诚实的人品。如果原来的同路人不对他们过去的行为负责任的话，如果由于某些不足惧的法律迫害，或者一个很小的职位而嫁祸于人，甚至放弃自己的信仰，我对这些人很恼火。这倒是应了一句话：软弱的强大是源于它的适应性。

我没有把德国作为事件的中心。1989—1990年，已经不仅仅是民主德国的消失。在欧洲，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崩溃了。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从政治地图上消失。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历史的、世界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主观的原因，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1989年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事件只是这一长串事件的开端。它原本应该成为一个改革了的民主德国，一个革新了的社会主义。它本不会在走向一个统一的德国的道路上出现逆转。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某些事情只能被接受，如果人们认识它们的历史根源的话。本书的起点首先要回到1989年以前的日子，那是先于本书内容的时间。

我在本书中谈到的许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显得前后矛盾。这些矛盾现象是由于它们是以那个时代的观点而保留在这本书里面的。那些日子在主观上是真诚的，在客观上则是对许多紧急事件是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必须立即做出的重大决定。由于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因而也不能被人理解，所以，发生了错误，或者话到了嘴边又不得不咽了回去。在许多事情的处理上缺少必要的解释、分歧和筹划。当时的事情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现在，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把那时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前因后果做一番梳理。这个梳理应该从1989年以前精确的时间表开始叙述起，比如，从什么时候，是谁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改为“我们是一个民族”的，民主德国为什么以及怎样从开始进行改革，最后演变为并入联邦德国的。

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令人不安的，它不仅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还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我是作为民主德国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最高负责人来思考这段历史的。今天，我对许多事情看得更加清楚、准确了，因为我知道了在那时不知道的，或者是被隐瞒了的许多事情的前因后果。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常常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这是因为我被开除出党，而党曾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还有颇显滑稽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我进行的政治和法律迫害，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乎我

的名誉，而且还剥夺了我的自由。在这个问题上，我从不抱有任何幻想。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贝特·维内在 25 年前就曾经对此做过透彻的解读。当时是 1973 年 5 月 30 日，我在柏林与他谈话时，他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告诉我：“谁曾经是共产党人，那他就会被文明社会迫害到死为止。”

埃贡·克伦茨
1999 年 7 月，柏林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秋天即将来临

——1989年7月7日—10月7日 /1

- ❁ 1 政治咨询委员会——这个会在那年是怎样召开的? /1
- ❁ 2 华沙条约国之间的矛盾 /2
- ❁ 3 100年和柏林墙 /9
- ❁ 4 匈牙利和华沙条约 /12
- ❁ 5 在昂纳克的病房里 /14
- ❁ 6 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他们的教义 /20
- ❁ 7 政治局休假 /29
- ❁ 8 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辩护 /32
- ❁ 9 不知所措和听天由命的情绪开始蔓延 /34
- ❁ 10 一场没有结束的谈话 /37
- ❁ 11 公众要求解释，但是，政治局依然保持沉默 /43
- ❁ 12 昂纳克和我 /48

- 13 为了民主德国的改革 /56
- 14 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60
- 15 民主德国 40 年庆典前夕 /61
- 16 有戈尔巴乔夫参加的政治局会议 /64

第二章 充满希望和抉择的日子

——1989 年 10 月 8—17 日 /66

第三章 躁动和疑惑的日子

——1989 年 10 月 18—31 日 /106

第四章 从莫斯科会见到边境开放

——1989 年 11 月 1—10 日 /165

第五章 徒劳的幻想

——1989 年 11 月 11 日—12 月 6 日 /232

第六章 以后的日子 /313

- 1 党的代表大会和党的工作委员会 /314
- 2 圆桌会议 /319
- 3 吞并代替了统一 /322
- 4 被宣布为不合法 /323
- 5 与法治国家打交道的体会 /327

- 6 诉讼和判决 /332
- 7 两封信和两种看法 /336
- 8 还没有说的关于德国的最后的话 /347
- 9 关于德国的思考 /351

第一章

秋天即将来临——

1989年7月7日—10月7日

对于我来讲，这一年的秋天是从仲夏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了冲突，这些冲突是多年积压下来的。民主德国不是一个政治孤岛。1989年10月和11月发生的事件是有它的内外原因的。

1. 政治咨询委员会——这个会在那年是怎样召开的？

7月7日：华沙条约组织国的党政领导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开会。会议是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最高政治委员会的政治咨询委员会会议。

华沙条约组织是在1955年5月，作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接纳联邦德国的做法的回应而建立的。

第一个仪式是近十年以来一直不变的内容：东道国的代表迎接出席会议的到访客人。今天迎接客人的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会议总是由苏共第一书记首先致开幕词，这是从尼基塔·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后来，戈尔巴乔夫也保持了这个传统，即由苏联致开幕词。他首先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然后是其他华沙条约国家党的领导依次做提纲发言。其实每个国家里都有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关于大政方针

方面的分歧。但是，没有一个人公开谈论这些。相反，这些国家党的领导却都在赞扬他们本国的政策。

全球军事态势是会议日程中的重要内容。

苏联陆军元帅彼得·卢舍夫担任联合武装力量最高司令，他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做了一个题为“在欧洲武装力量的对比关系中保证防御力量的措施”的报告。报告中的敌对双方是西方和东方。

北约经常在距离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线只有几公里的地方举行军事演习。最高司令在报告中指出：“这将越来越难以判定，这种演习是否只是一种真正的军事演习，还是一种具体的为入侵进行的军事准备。我们必须在1989年里摆脱北约的军事威胁。”（注：联合武装力量最高司令苏联陆军元帅彼得·卢舍夫在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政治咨询委员会1989年7月8日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报告——作者）由此，大家一致通过联合武装力量的防御计划继续采取“军事手段做好抵御北约进攻的准备工作”。（注：联合武装力量最高司令苏联陆军元帅彼得·卢舍夫在华沙条约组织缔约国政治咨询委员会1989年7月8日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报告——作者）

会议是以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而结束。

华沙条约组织的最高峰会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运行的。从1984年起，我就成为民主德国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每年都要经历一次这样的过程。但是在1989这一年，这个会议的严格的会议仪式却出现了变化。

2. 华沙条约国之间的矛盾

在这一年的政治咨询会议上出现了关于“冷战是否已经结束了”的疑问。

匈牙利最高领导人的回答是：“对，冷战已经结束了。”

戈尔巴乔夫持反对意见。在前一天，即7月6日，他参观了欧洲议会。在欧洲议会的讲台上，戈尔巴乔夫对全体欧洲议员抱怨说，北约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是新的冷战思维。他说：“我们面对的困难是，西方把克服欧洲的分裂当成是战胜社会主义。”（注：米哈伊尔·S.

戈尔巴乔夫1989年7月6日在欧洲议会的讲话,《新德意志报》,1989年7月7日——作者)他用这句话响应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于5月底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北约峰会上,要求苏联回到“西方的价值观”上来。他所谓的欧洲是指,“从布雷斯特到布雷斯特”。(注:西面的布雷斯特是法国西北部一个大西洋海湾上的小镇;东面的布雷斯特是苏联的一个边境城市,现位于白俄罗斯境内。这个边境城市地处一条大河的河弯上,河的对面是波兰——作者)戈尔巴乔夫把布什的讲话当成是对他的在战后边界上构筑“欧洲大厦”设想的挑衅。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讲,北约协商会议的决议是与他的想法完全对立的。

波兰的国家首脑沃希奇·雅鲁泽尔斯基也不相信冷战已经结束的说法。他认为,调整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的办法在于尊重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已经被确定下来的欧洲格局。他批评“联邦德国宣扬大德国的野心”。因为他认为,“大德国的边境最后肯定会扩展到波兰,就像德国历史上在1939至1945年曾经做过的那样。”(注:摘自作者的笔记——作者)

由于这次布加勒斯特峰会上的讨论显得剑拔弩张,我感到有些紧张,好像要发生些什么事。我希望社会主义国家能找到一种力量,沿着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振兴,击退北约的外交挑衅。

当我同昂纳克和其他的民主德国的代表团成员一起走进会议大厅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已经坐在他们的座位上了。会议大厅是一个圆形的大厅,中间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会议桌,各国代表团围绕着会议桌,按国家名称的字母表顺序就坐。

昂纳克轻声地,几乎是耳语般地跟我说:“好家伙!”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刺激了他。等他指给我会议桌旁我们代表团的座位时,我才明白:我们代表团的座位紧挨着匈牙利代表团。与我们咫尺之近的匈牙利新领导是莱斯左·尼尔斯。昂纳克对他非常不感冒,这是事出有因的。《新德意志报》(注:当时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现在是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日报——作者)在几天前,发表了一篇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第8次中央委员会的报道。报道中有这样的内容,即

德国统一社会党打算派军队进入匈牙利。在匈牙利国内，有一种势力在活动，这股势力打着革新的旗帜，却干着埋葬社会主义的事情。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以后，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不公开表示对其他兄弟国家内部事务的不满。这篇报道使匈牙利感到被我们伤害了。

长期担任匈牙利党最高领导的雅诺斯·卡达尔于7月5日逝世。卡达尔的同志把他的政策与他一起送进了坟墓，甚至是在卡达尔去世之前就先埋葬了他的政策。现在，匈牙利人正在尝试着走一条国家举债的道路，匈牙利向西方的贷款达到170亿美元。到1989年底，匈牙利已经没有了偿还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完全控制了个国家。（注：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在货币政策和支付渠道方面促进各国间的合作，因其中多数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所以，他们借助货币基金的合作来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进行改革——作者）

匈牙利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成员都是新人。表面上，匈牙利代表团的头是党的主席尼尔斯，但实际上，真正的操纵者是外长吉拉·霍恩（霍恩长期担任匈牙利统一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外交部门的领导。1989年之前，他开始担任匈牙利外交部长——作者）。这就是说，在1989年5月2日匈牙利决定开放与奥地利接壤的边界事件中，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霍恩得到了西方国家给匈牙利经济援助的回报。

昂纳克和我是在1989年5月3日早上，通过新闻通讯社的消息知道了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边界哨卡的事情。当时，我们正在一架飞往捷克斯洛伐克准备进行国事访问的专机上。我也没想到自己会非常冷静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昂纳克。

“艾里希，”我说，“也许这样会更好一些，如果我们直接同匈牙利的同志谈一谈的话，或许你应该在本月中旬乘坐狩猎者号（注：专指非官方会晤的外交用语——作者）去匈牙利，就所有问题同他们坦率地交换意见。”

昂纳克并不这么看。他说：“匈牙利是开放他们的边界，还是我们的？另外，卡罗里·格罗茨曾告诉过我，匈牙利只是加固边界篱笆，就像我们的柏林墙一样。匈牙利与民主德国的关系不会因此而有任何变化。格罗茨还向我保证，匈牙利现在实行的多党制根本不是那种资产阶

级多元化。他们的多党制只是与其他的党共同工作，就像我们与联盟党的关系一样。”

昂纳克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视而不见，因而我决定坚持我的建议，我说：“匈牙利是我们最重要的旅游地，匈牙利目前的状况迫使我们考虑，将来我国公民还能不能再到那儿旅游了。”

昂纳克不愿意去匈牙利，他不愿意当一个乞求者。匈牙利和民主德国同属于一个阵营。这个阵营是建立在共同签署的华沙条约的基础之上的，匈牙利有责任履行它在条约中所承诺的职责。

转眼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我们在布加勒斯特坐在距离匈牙利代表团只有几米远的地方，昂纳克没有向匈牙利代表团走过去。来自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这两个兄弟党的领导人除了简单的“您好”之外，没说一句话。这种局面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直到今天还坚持认为，尽管匈牙利所采取的很多做法与我国不同，但是，我们两国之间没有通过兄弟般的讨论而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两国领导人这种用固执己见代替政治理智的做法，也让我感到很痛苦。但是，太多的事情是无法控制的。

为了避免尴尬，我只好转向我的左边邻居——波兰代表团。波兰代表团的领导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最近一些年来，我和雅鲁泽尔斯基几乎是每年见面。他访问民主德国时，就由我陪同他，而我访问波兰的时候，也是他接见我。这种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官方礼节。雅鲁泽尔斯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的一个从不自吹自擂的人，他坦率地告诉我关于他的国家目前的政治、经济状况。他本人同苏联和民主德国感情深厚，但他首先是一个波兰的爱国者。他从来不向我隐瞒他内心的这种分裂和冲突：1981年12月，波兰宣布实施战争状态使他在他的许多同胞中和在西方人中得到了一个驻波兰的苏联总督的名声。而实际上，正是由于他所采取的措施，才保证了波兰的独立主权和欧洲的和平。

今天，1989年7月7日，他看起来非常沮丧。他毫不掩饰地告诉我，波兰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令他十分担忧。在共产党人和反对派谈判的圆桌会谈中，他的党势力很弱。作为反对派的团结工会马上就要成为合法组织了。波兰统一劳动党在新选出的议会中，将成为少数派，即党在议会中的议员只占总数的38%。鉴于这种情况，应当授予波兰总统

享有更大的权力——成为全权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向我解释说：“圆桌会议是使波兰最终走向正常状态国家的一个机会。”但是，他的党在议会选举中遭到了失败。国家的权力被分割了，而分割出去的权力落在了大街上。雅鲁泽尔斯基的同事迫使他：交出国家最高权力，然后参加竞选，以竞选的方式去获得国家最高权力。他说：“我希望参加一种程序合法的国家总统的竞选。因此，我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竞选。现在，最时髦的话题是多元化、民主和改革，对此我完全同意。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工作、纪律和责任。我反对在社会生活中由无政府状态控制的现象存在。”（注：摘自作者的笔记——作者）

我们的谈话被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所打断。作为东道主的齐奥塞斯库同所有参加峰会的代表团逐一握手，表示问候。在走到匈牙利代表团的时候，他绕了过去。也许，在这以前他们已经问候过了，只是我没有注意而已。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民族冲突。两个国家互相指责对方，说在对方国内存在着严重迫害少数民族的现象。

一种观点始终在我的头脑中萦绕，直到今天仍是挥之不去。这个观点既不能说得很具体，也不能很概括。总之，我一直感到，在我们的联盟中缺少一种共同利益，还有就是各国之间表现出的傲慢和互不信任。我们相互称之为兄弟国家，但是我们几乎不能坦诚地，平心静气地相互交谈，更不用说富有建设性地合作了。尽管存在这么多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对于我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仍然是我们对抗西方国家的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团结，对于民主德国来讲是最糟糕的事情。

那时并没有所谓的柏林—布拉格—布加勒斯特的一个派别轴心对抗莫斯科—布达佩斯特—华沙—索非亚这样一个改革轴心的事实。也不存在什么教条主义者的联盟反对改革者。根本就不存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问题。它只是涉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如何加强合作，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进攻。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这次峰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必须统一认识，即如何回应北约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而制定的新战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莫斯科和柏林的意见要比莫斯科和布达佩斯特的意见更相近一些；戈尔巴乔夫与昂纳克的关系要比戈尔巴乔夫